

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整合及基本特征

薛玉坤*

<目次>

- | | |
|-----------------|------------------|
| I. 前言 | III. 江南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 |
| II. 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整合 | IV. 结语 |

I. 前言

山温水软的烟雨江南，独具秀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驻足流连、吟绘赋咏。从吴越春秋争霸中的英雄，到唐宋时期的诗人词客，一代代风流人物徜徉于斯，放旷于斯，甚至归老于斯。虽说繁华竞逐，风物尽前朝，但他们的生活形态、精神风貌以及那些任情使性的文字却逐渐沉潜为一种区域文化精神，强烈吸引着后人追寻的目光。

一般来说，区域文化精神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长期交互作用下逐步整合而显现出来的，它包含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认识的总和。一方面，它不断变易、逐渐丰富，随着人类各种活动的渐次展开而不断有新的内容补充并逐渐沉积；另一方面，它又相对稳定，始终保持着一种使之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品质。而在此过程中，基本的地理环境，如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等，常常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限定，规定了这一区域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

但是，我们讨论江南文化精神形成的基本机制，要注意反对地理环境绝对

* 中国苏州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论的倾向。江南的地理环境只是给江南文化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地理背景, 其对文化精神的影响, 我们必须辩证地看。

首先, 江南的地理环境对江南文化精神有着先天制约性, 它独特的地理背景决定了江南文化在一些基本文化因素方面, 如生产力的结构和布局、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人的生理和心理素质等等都区别于其他区域。这里产生不了游牧民族粗犷豪放、自由爽朗的民族性格, 也产生不了海岸居民冒险猎奇但又机智沉着的民族性格, 可以说, 在独特地理基础上形成的江南文化的原初本态构成了区域文化的核心内容。

但江南文化精神的形成又不完全受制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并不会使得江南文化一开始具备某种状态, 就一直保持不变, 同样也不会因其突然变化——如洪水、地震等而使得区域文化特质就立刻发生改变。江南文化精神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自我生长起来的。正如人的成长一样, 其出生时所带有的先天种族、民族的遗传基因固然会决定着他的体格、甚至是性格, 但真正影响他情感、心理和性格形成的是他后天的成长环境。显而易见的是, 从远古以至现代江南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其文化特征却有着不同。因此, 我们必须将江南文化精神放在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其形成。

II. 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整合

就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来看, 江南区域虽然开发得也很早, 但在其发展之初, 却一直被中原认为是非华夏正宗的“荆蛮之乡”¹⁾。这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在“自居正统”的心态下, 基于“夷夏之辩”的文化偏见。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 江南地区的古文化其实应与黄河文化一样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系列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 不仅把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 而且其随葬物已初步显出了有别于中原文化的江南文化特征。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比较多的随葬物是玉器, 这些玉器以琮、璧最为珍贵, 属于人工

1) 《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化、图案化、装饰化的造型，多在特定的平面上雕刻精细的装饰线纹，是一种和美、细润、优雅且含有深邃的人文观念的阴柔性文化形态。²⁾而相比较而言，稍晚于良渚文化时期属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却很少发现玉器，出土比较多的则是彩陶。其装饰风格多显现出雄壮、饱满、浓烈的特征，完全不同于良渚文化的纤巧精细。这种现象显示出南北文化精神的初步分野。

江南文化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自我繁殖起来的，其文化精神的形成还得力于文化交流。当商、周之际泰伯、仲雍南奔“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³⁾“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⁴⁾泰伯、仲雍完全是以中原之礼来治理国家，所谓“泰伯端委，以治周礼。”⁵⁾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在此以后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在政治上，这一地区经历了吴越楚的争霸，经济上，农、渔、丝织、铜器、陶瓷、铸剑等行业的生产规模逐渐扩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地区对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吸收，也加速了这一地区的“文”化。比如季札观周乐于鲁就是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文化行为，此外，如言偃北上从游于孔子，后被誉为“南方夫子”等等。这些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明代姜渐《修学说》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

昔三代之有天下，文莫备于周，而泰伯实启之；教莫盛于孔子，而言偃实师之。自泰伯以天下让，而吴为礼义之邦；自言偃北学于圣人，而吴知有圣贤之教。由周而降，天下未尝无乱也，惟吴无悖义自民；由汉以来，天下未尝无才也，惟吴多名世之士。虽阅千载而泰伯、言偃之风，至于今不泯。⁶⁾

这段文字虽然颇多溢美之处，但对泰伯和言偃“文开吴会”、“道启东南”的历史作用却有着准确的定位。虽然《汉书·地理志》中还称“吴、粤之君皆好

2) 《周礼·春官·大宗伯》云：“黄琮礼地”、“苍璧礼天”，琮、璧抽象的造型区别于具象的雕塑，实含有很深的人文观念意义。

3) 《吴越春秋·泰伯传》。

4) 《吴越春秋·泰伯传》。

5) 《春秋左氏传·哀公七年》。

6) 民国《吴县志·文庙》，转引自王卫平《论太湖地区文化重心地位的确立》，见《史学月刊》1993年 第4期。

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但这样的尚武风气与北方地区“悲歌慷慨”的民风相较而言，充其量只能算是柔中带刚。

秦汉的天下一统，最终从包括文字和典章制度上都将江南文化融入进了中华文化圈，但江南文化的区域特征并没有就此消失，相反，随着文化整合的深入，特别是在汉代以京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文化网络出现之后，在气度恢弘的时代精神映现之下，江南地区精细优雅的文化精神凸显得就更为明显。这期间虽然中原儒家文化与江南本土文化的融合步伐加快，但文化的区域差异并没有消融。特别是从王莽新政到东汉初期，由于黄河流域陷入了大规模的战乱之中而江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于是大批士人纷纷南迁这些南迁，士人实际上是文化流动的载体，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初年，“天下初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多称多士。”⁷⁾建武六年，李忠任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⁸⁾但是，这些活动只是加深了江南文化的“文”化趋向，对江南文化固有的纤纤灵动的特质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被认为是汉武帝时采采的十五首“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可以说显现了江南文化精神在民间的传承。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乐府解题》称此诗是：“江南古辞，盖美芳晨丽景，嬉游得时。”

东汉末年，礼乐大崩。大致从黄巾起义到西晋灭吴，中国陷入了前后百余年的分裂。其间孙吴立国江东，开始了江南地区的“六朝时期”。这是江南文化成熟的一个关键期，学者所习用的“六朝文化”一词所标识的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还有着空间的含义。学界关于“六朝文化”的论述已相当深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学者一般认为“六朝文化”是一种“文人文化”，这一点并没有错，

7) 《后汉书·任延传》。

8) 《后汉书·李忠传》。

但文人文化只是主要存在于文人之中,属于雅文化的范畴,它并不能代表六朝时期江南文化的全部,换言之,要探讨六朝时期江南文化的特征,就不能仅依据文人文化。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六朝文化应该是文人气和平民气的结合。

关于六朝时期江南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宋书·沈庆之传》中有云:“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当北方中原地区杀戮频仍,民不聊生之际,江南处于有利于文化发展的相对稳定之中,加之为避战乱北方世族的纷纷南迁,南北文化再度发生碰撞和融合。这一切都使得江南文化快速成熟起来,无论是哲学、文学、绘画、书法,还是雕塑、乐舞等,比起前代来,都表现出进一步的深化。而六朝文人最具个性的地方就是其审美化的人格,这一时期文人普遍的理想是以生存的自由为精神指归,追求文学和艺术自我愉悦和心灵的自足自在。所以我们与其说六朝文化中的雅文化是“文人文化”,毋宁说它是一种“才子文化”更为准确。正如宋郑文宝所说:“自古及近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⁹⁾,杜牧亦有诗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¹⁰⁾梁简文帝为会稽王时,“尝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蒙温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而蒙性和畅,能言理,辞简而有会’”¹¹⁾,南朝齐吴兴乌程人丘灵鞠不乐武位,也曾对人说:“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¹²⁾这种人格精神表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就是追求优游逸乐,喜好柔靡轻佻、浓丽哀艳。我们阅读《晋书》、《宋书》、《南齐书》等六朝史书和六朝诗文,感觉最强烈的就是充斥其间的洒脱、飘逸、风流、旷达的“才子”形象,以及背后隐藏着的文人对个体生命的自由体验。顾炎武云:“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斗狠劫杀,安、史之馀化也。”¹³⁾虽将江南奢淫喜靡的士风归咎于帝王之遗风有欠公允,但从中我

9) 见《江表志》,四库全书本。

10) 杜牧《润州诗二之一》,《全唐诗》卷522。

11) 《晋书》卷九三《王蒙传》。

12) 《南齐书》卷五二《丘灵鞠传》。

13)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们可以看出弥漫在六朝社会上下的生活追求。

当然，正如上文所说，文人雅文化并不是六朝文化的全部，文人文化所显示的六朝文化精神其实在俗文化圈中也有类似的体现。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繁荣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背景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六朝都城建业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同时还是经济中心：“贡使商旅 方舟万计”¹⁴⁾，“市廛列肆 埒于二京”。¹⁵⁾当时之人，“因贪成鄙 成为风气”，加之帝王“乐效商贾贩鬻之事”¹⁶⁾，所以城市的商业氛围可谓空前浓厚。城市物质生活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生活的丰富。据《南史·循吏传》中记载，当刘宋太平之世，“凡百户之乡，有市有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又云齐永明之时，“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袿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裴子野《宋略·乐志》也称：“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于是，就连此时的民歌也开始出现了“城市化”的倾向。¹⁷⁾

南朝乐府民歌主要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而前者主要产生于以建业为中心的江东地区(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江南地区)。《宋书·乐志》云：“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后来，稍有增广”，《晋书·乐志》亦云：“盖自永嘉渡江以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这些歌曲大多是在城市中由歌女在宴会等各种场合演唱的，歌中反映了当时江南区域(主要是城市)的民间风俗、社会状况。不论是《子夜歌》、《读曲歌》，还是《懊侬歌》、《神弦歌》，我们发现，其中比较普遍的是表现对爱情的单纯热烈的浪漫追求，情绪伤感，题材哀艳，这种较少考虑伦理因素的追求，实际上表现出对人生的幸福与快乐的渴望，是对“人”的尊重，这些和六朝文人文化可谓是异形同质。这样的城市环境无疑会进一步滋长江南文化精神中奢侈绮靡的风气。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六朝江南区域的雅、俗两种文化形态实际上呈现出相互补充、相互影

14) 《宋书·五行志》。

15) 《隋书·地理志》。

16) 参见王孝通《中国商业史》第四章《两晋及南朝之商业》，商务印书馆 1998年 4月影印 第1版。

17) 参见王晓丽《南朝文化和乐府民歌的城市化倾向及其对唐宋词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 第5期。

响、相互促进的态势。至此,江南文化精神大的“轮廓”差不多已经“完型”。

唐代开始,江南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深化期。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在全国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唐本起于陕西,但财赋却仰仗于东南,王夫之称“唐立国于西北而根植根于东南”。¹⁸⁾在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已逐渐成为天下财富之区,时人谓为“天下大计,仰于东南”。¹⁹⁾而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文化中心的南移也加快了步伐。特别是从安史之乱迄五代的二百五十年间,中原混战,居民流徙,田园荒废,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而南方却比较安定,虽有争战,但毕竟规模较小。并且南方国君普遍实行“保境安民”政策,故而经济文化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文物炳耀,远胜于北方。有学者统计,在唐代有据可查的1126名进士中,吴楚进士达209人,占全国的18.6%,而且这些进士绝大多数都是在唐后期登科的。²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流向南唐和西蜀的士人构成区别本身也显现出了本文所说的“江南”文化的某些特征。四川是唐代皇族传统的避难之地,唐崩溃之后,西蜀又集中了大量唐朝的遗臣。王建政权“所用皆唐名臣士族”²¹⁾,故西蜀文化中有唐代贵族文化特别是宫廷文化的因素,蜀主所为也都尽力效仿唐代,显示了对唐文化的仰慕。而流向南唐的士人中虽不乏饱学之士,但出身名宦世家者少。故南唐文化没有贵族文化、宫廷文化的气氛,而多了一种平民气和文人气。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士子普遍是“才华横溢,多才多艺,醉心有较高文化价值的艺术天地和精神生活;追求物质享受,标新立异,对所谓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圣贤之言,并不尊奉,政治思想上不蹈绳墨,有点儿越轨为当权卫道士所不悦;富有某种创造力。”²²⁾这些都表明了江南文化精神中雅

1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18页。

19) 《新唐书·权德舆列传》:“贞元八年关东、淮南、浙西州县大水,坏庐舍,漂杀人。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今霪雨二时,农田不开,庸亡日众。宜择群臣明识通方者,持节劳徕,问人所疾苦,蠲其租入,与连帅守长讲求所宜。赋取于人,不若藏于人之固也。’”

20) 参见陈国生、杨晓霞《唐代的文化区域》,《衡阳师专学报》1997年2月。

21) 《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王建传》。

22) 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俗兼容并包的特质。

入宋以后，由于物产的丰富、交通的便利以及历史上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江南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进一步确立。与此背景相适应，宋代社会本身的重文趋雅的文化特性，将江南文化精神中雅韵的倾向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江南更是成为“士大夫渊藪”。

北宋初年，由于政局的稳定，且建都于北方，加之统治者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文化重心南移的步伐曾一度停滞，南方士人亦受到相当压制，文化重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摆，当时的“士大夫渊藪”并不是江南而是在洛阳。如《墨庄漫录》卷四云“许洛两都轩裳之盛，士大夫渊藪也”。《东轩笔录》亦称：洛阳所聚，“皆一时文士，游宴吟诵，未尝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园圃之胜，无不到者。”这种情况一直到宋代中后期才起了些微变化，陆游云：

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用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²³⁾

靖康之变后，随着大批中原士子跟从皇室来到江南，“江浙人文藪”的地位也最终得以确立。各种文献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北方士人济济于江南地区的盛况：

建康府：“名儒生士多因避地来寓溧（为建康府属县）上，往往乐其风土而定居焉。”（《景定建康志》卷42）

镇江：“中原士大夫又多侨寓于此”。（《至顺镇江志》卷18）

平江府：“衣冠之所鳞集，甲兵之所云萃，一都之会，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众。”（《吴郡志》卷38《县志》）

湖州：“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嘉泰吴兴志》卷20“风俗”）

秀州：“（崇德县）南渡初士大夫来寓者殆二十家。”（《至元嘉禾志》卷3）

绍兴府：“予（指陆游）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

23) 《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渭南文集》卷。

(陆游《渭南文集》卷34《杨夫人墓志铭》)

……

而与此同时,统治者对大量南来士大夫也采取了安抚政策:

(二年四月)壬午,诏内外侍从、监司、守臣各举中原流寓士大夫三二人,以备任使。(《宋史·高宗本纪》)

(四年五月)癸亥,诏中原、淮南流寓士人,听所在州郡附试。(《宋史·高宗本纪》)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命诸路收试中原流寓士人。(《宋史·高宗本纪》)

大批南迁的北方士人聚集在江南一带,与本土士人一起,构成了江南地区庞大的士人群体。建炎年间郑穀言:“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于此”²⁴⁾,确非虚言。

文人士大夫在江南的聚集,直接导致了江南地区文化的昌盛,强化着江南文化精神中“雅”的特性。

与此同时,随着宋代坊市制的打破,也使得城市的商业更加繁荣,而“坊郭户”²⁵⁾的出现,则更标志着贵族门阀的式微、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适应这一阶层人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江南文化精神中“俗”的特性也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到明代,从各种话本、白话短篇小说在江南的大量产生,以及瓦肆勾栏在江南城乡的遍布,都充分展现了宋元以后江南地区俗文化的蓬勃发展。关于这一点,学者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言。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江南文化精神中的原本就已存在的雅俗两种倾向,分别经过宋、明两代的发展,都已逐步走向成熟,最终形成了雅俗兼容的江南文化精神。

2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引。

25) 宋代将城市户口单独定等列籍,称为坊郭户。参见《宋史·食货志上》。

III. 江南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

江南文化精神的形成实际上是得力于以下三点：一、秀美山水环境的滋养；二、城市商业文化的熏陶；三、开放性的文化交流姿态。在本质上，江南文化精神是一种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化，也是一种高度审美化的文化，其审美形态表现为柔婉轻清、空灵飘逸和凄迷感伤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对人的基本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的映照之下，通过上文的回顾，我们发现江南文化精神更强调的是人的个体价值的实现，是普遍的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文人在江南温山软水中的驻足流连，是在都市酒筵歌席上的倚红偎翠。作为核心，笔者以为以下两点构成了江南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

其一，江南文化是“主情”的文化。

在江南文化传统中，人对于自身的体认有着非常自觉的意识。对于人的价值的估价和肯定，不是儒家思想中的功、德、言，而是人的个性、智慧、情感、情调、风度等等。比如，六朝人在对两汉儒学的反思、宇宙本体的追寻，以及名教和自然关系的论辩中，重新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自然山水中体会到了某种异质同构的玄理。正如英国人劳伦斯·比尼恩所言：“山被想象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的肉，水则被看成是它的血。大自然的生命并不是被设想为与人生无关的，而被看作是创造出宇宙的整体，人的精神就流贯其中。”²⁶⁾ 当人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然、宇宙、社会，看待自身，人本身也就成了审美的对象物，这一趋向被钱穆先生称为“个人自我之觉醒”。²⁷⁾ 这种觉醒，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他们“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是以内在的思辩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

26) [英]劳伦斯·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第5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27) 钱穆《国学概论》第147页，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²⁸⁾而伴随着人的被发现,人的情感也得到了全面发育。在我们眼前跃动的江南文人通常是灵动的、超脱的、自由的、潇洒的,有着从容优雅、望若神仙的举止风度。由吴入洛的陆机提出“诗缘情”的论断不能不说与他生为南人而且深受江南文化精神影响有关。

江南文化精神表现出强烈的“主情”色彩,这里的“情”有其特定的外化形态,亦即哀怨缠绵、柔婉轻清、闲逸恬淡的审美取向。这一点,在南方文学的审美传统中亦有明显的表现。颜子推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岐路言离,欢笑分首。”²⁹⁾“下泣言离”与“欢笑分首”充分显示出了江南和江北不同的情感表现形式。

其二,江南文化又是“尚文”的文化。

上文说过,还在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随葬玉器就已表现出了江南文化和美、细润、优雅的特征。虽然其后《汉书·地理志》中还称“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但至迟到永嘉南渡之后,江南文化已彻底转变成“尚文”了。这里的“文”,笔者以为应该包括三层含义:

- 一是和“刚”相对,表现出尚“柔”的倾向。
- 二是和“质”相对,表现出重藻饰的审美趋向。
- 三是和“经史”相对,表现出对“文辞”之学的重视。

陆机在提出“诗缘情”的同时,还加以“绮靡”的限制,《吴郡图经续志》卷上《风俗》评苏州世风亦云:“盖朱买臣、陆机、顾野王之徒,显名于历代,而人尚文。”

历史上曾有过多对江南文化的批判。其矛头所指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体现了江南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如隋文帝立国之后,曾下诏曰:“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³⁰⁾李谔也上书指斥六朝,要求正文体,他说:

28)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91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29) 颜子推《颜氏家训》。

30) 《隋书》卷二《帝纪二》。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³¹⁾

李谔对江南文化的批判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夏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³²⁾很显然，江南文化精神的“主情”和“尚文”是有悖于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江南文化在后世常常为人所诟病。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到了北宋，宋太祖甚至刻石于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³³⁾朝廷取士基于“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³⁴⁾的认识，亦往往重北轻南，南宋陆游在其《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曾批评说：“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在当时，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南人“轻巧”，在承认南人有才思、多智慧的同时，又批评他们短德行。这很显然并非是基于现实生活的体认。《宋史》中评两浙路云：“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顾炎武评南方学者之病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³⁵⁾也是褒贬兼之，一直到清代的江藩《宋学渊源记》还认为：“北人质直好义，身体力行；南人习尚浮夸，好腾口说。”

在宋代科举中，江南士子中进士科的多，而北方士子则中诸科的多。这同样与区域文化精神的取径不同有关。因为进士重文，而诸科重经。欧阳修称：

31) 《北史》卷七七《列传》第六五。

32) 《北史》卷七七《列传》第六五。

33)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

34) 《宋史·选举志一》引司马光言。

35)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³⁶⁾ 冯拯说：“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³⁷⁾ 宋敏求亦云：“河北陕西河东举子，性朴实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³⁸⁾ 江南文化精神中“主情”、“尚文”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士子科业的选择。宋代南北区域在辞章和经史上分野实际上显现的正是古已有之的南北传统文化精神的差异。

总之，不管是赞赏羡慕，还是批判嫉妒，众人的言说已充分显示了江南文化“主情”、“尚文”的精神传统。

IV. 结 语

江南文化精神的基本特性由江南区域的基本地理环境所限制，在长期的历史整合过程中，这一区域文化特性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早在古文明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就已显示出与北方文化的分野，经春秋、战国、秦汉多年的发展，至六朝时期，江南文化精神初步显示出雅俗兼容的特性。其后，宋明两代又分别深化了这两种趋向，最终形成了江南文化精神“主情”、“尚文”的基本特征，在本质上它更强调人的个体价值的实现。这一点在强调修齐治平、强调人的社会价值的传统儒家社会，尤其显出特别的价值。

< 국문초록 >

강남문화는 중국에서 매우 중요한 지역문화의 하나로, 본고는 곧 그 문화 정신의 역사적 정돈·통합과정과 기본 특징을 집중적으로 탐구하였다.

강남 지역의 문화는 일찍이 고대 문명시기에 이미 북방문화와의 차이를 나타내었다. 그리고 春秋·战国·秦汉의 장기간의 발전을 거쳐 六朝시대에

36) 《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论逐路取人札子》。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元年。

38) 《宋史·宋敏求传》。

이르러서 강남의 문화정신은 雅俗兼容의 특징을 서서히 나타내기 시작하였다. 그 후 송·명 兩代에는 그 두 경향이 심화되었고, 그러다 마침내 최종에는 강남문화 정신의 “主情” 과 “尚文” 의 기본 특징을 형성하기에 이르렀다. 본질적으로 강남문화는 개개인의 가치실현을 중시하고 있는데, 이는 인간의 사회가치를 강조하는 전통 유가사회에서 더욱 특별한 의미를 가진다고 할 수 있다.

주제어 : 江南文化, 历史整合, 基本特征, 雅俗, 主情, 尚文

